



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研究

丛书主编 刘放桐 陈亚军

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

刘放桐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研究

丛书主编 刘放桐 陈亚军

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

刘放桐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刘放桐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1

(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研究/刘放桐,陈亚军丛书主编)

ISBN 978-7-309-12488-0

I. 杜… II. 刘… III. 杜威(Dewey, John 1859-1952)-哲学思想-研究 IV. B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8383 号

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

刘放桐 主编

责任编辑/方尚芩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 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 × 960 1/16 印张 28.25 字数 373 千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488-0/B · 586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杜威研究与《杜威全集》翻译”
(项目批准号: 12&ZD123) 成果之一
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总序

刘放桐 陈亚军

在西方传入中国的诸多哲学思潮中,若论影响之巨大,经历之坎坷,除马克思主义外,大概没有哪一个可以和实用主义相比。从一百年前的热捧,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鞭笞,再到近二三十年来的正视,中国思想学术界对待实用主义的姿态,经历了令人晕眩的大转变,其中折射出国人对待实用主义的复杂心态。不久前《杜威全集》(38卷)中文版的问世,向人们传递出这样一个消息:经过老一辈学者的筚路蓝缕、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学界对于实用主义的译介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用主义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值此时刻,人们自然会问,如此关注实用主义,意义何在?我们的回答是:

首先,实用主义乃美国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础。从开国元勋到民主、共和两党领袖,从心系国家大事的硕学鸿儒到只关心衣食住行的贩夫走卒,美国人所奉行的基本哲学,归根结底,是实用主义。可以说,要弄清当今美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乃至政治、法律、外交等等,离开对实用主义的深入理解,只能停留在皮毛。欲了解美国,不能不了解实用主义。

其次,实用主义乃现代西方哲学转型的先驱。西方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向,说到底,就是理性主义传统向实践主义传统的转向,知识论传统向生存论传统的转向。二元式的思维方式被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所取代,对超验世界的眷恋被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所取代。在这一转向中,实用主义和马克思、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相互呼应、殊途同归。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从研究实用主义入手,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再次,实用主义乃中国传统哲学的知音。与西方哲学传统不同,中国

哲学从来没有产生出建立在二元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中国哲学传统所关注的天人合一、生活世界及伦理实践出发点,与实用主义有着极其相近的旨趣和追求。研究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异同,既有助于增强中国哲学的自信,也有助于改进中国哲学的缺憾。

最后,实用主义乃马克思主义的最佳对话者。同为现代哲学转型的典范,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有着大体相似的主张。它们从同一个方向批判西方哲学传统,又从同一个方向为未来哲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虽然途径有差别,话语有不同,观点也不无分歧,但它们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研究实用主义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同时也有助于看清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生命力,并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的思想资源。

与绝大多数其他西方哲学形态不同,实用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学院派哲学。这不仅表现在实用主义者们拒斥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割裂,而且也表现在实用主义深深影响了美国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事实。杜威在这一方面堪称表率。他的哲学早已越过学院围墙,渗透到美国文化土壤的方方面面。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紧密相连,唇齿相依。一方面,固然可以说,理解美国思想文化不能不理解实用主义;而另一方面,也必须说,理解实用主义不能不理解美国思想文化。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实用主义不可与研究美国思想文化脱钩。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研究系列的视野,比起一般的实用主义研究,要更加开阔:实用主义是这一视野的焦点,而美国思想文化则构成了这一焦点的“穗边”。

或许应该说明的是,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实用主义虽然起源于美国,但绝不限于美国。早在二十世纪初,尼采就已经被称作“德国第一位实用主义者”,而法国的柏格森与实用主义者的思想上的相近,也在他与詹姆斯的相互欣赏中表露无遗。再后来,无论是英国的维特根斯坦,还是德国的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阿佩尔、伽达默尔,或是法国的福柯、德里达,无不透露出浓重的实用主义气息。称不称他们为实用主义者,其实无关紧要。实用主义早已存在“在那里”,对于它的“在那里”的研究,同样是本系列所

欲涵盖的。

本研究系列旨在全面展示我国学术界实用主义乃至美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对话与交流、切磋与互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些支持,就不会有本系列研究成果的及时问世。

最后,我们也期待着学术界各位同仁的鼎力相助。让我们共同努力,将我国的实用主义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序言

“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是一个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它不仅涉及作为现代哲学的典型形态的杜威哲学本身，也涉及杜威哲学与整个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转型的关系，是这种转型的最有代表性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它涉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派别。从现实上说，它涉及与美国资本主义及其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的密切关系，是对美国资本主义及其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派别，甚至可以说是这种发展的一面镜子。要全面地理解美国，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成败得失，必须合理地理解杜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一直倡导并力图推动学界重新研究和评价杜威哲学。在我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的十余年中，曾多次建议设立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和杜威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的项目，得到了评审组和有关领导的支持。一些专家对这些课题的研究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由于这类课题牵涉面大，政治敏感性又强，提出新的见解不仅需要有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浓厚功力，还需要了解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美国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单个的研究者来说，即使付出了很大努力，也往往难以获得理想的成果。为了在这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功，需要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联合攻关。因此这也不只是需要一个课题，而是要有一系列课题彼此配合。我们自己准备这样做，并力图推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力量一起来这样做。

这个课题与 37 卷本《杜威全集》(加《索引》1 卷、《补遗》1 卷，这样中文版就达 39 卷)的翻译是同时进行的。《杜威全集》的翻译是一项基础性工

作。我们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开始筹划,因工程浩大,未能具体着手。直到 21 世纪初,才考虑如何具体进行。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复旦大学领导的肯定,国内许多同行专家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出版社也纷纷表示支持并积极参与。2004 年复旦大学成立杜威中心并立即把《杜威全集》的翻译当作中心的首要课题。尽管我们曾面对种种困难,但翻译工作一直在按计划进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们这项课题于 2012 年被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这给了我们很大鼓舞,也更加使我们感到责任重大,极大地推进了我们这方面的工作。

《杜威全集》的翻译毕竟只是为广泛、深入地开展对杜威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作准备。由于杜威的理论涉及哲学、社会、政治、教育、道德、心理、艺术、宗教以及思想文化的几乎所有方面,与美国和西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和变更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开展对他的理论的研究比单纯翻译他的论著当然重要得多,也必然要困难和复杂得多。我们既然组织翻译《杜威全集》,就必须同时考虑如何推动对杜威理论的研究。尽管我们的这种研究在开始时难以获得高水平的成果,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我们能认真地开展这种启动性工作,一定能推动学界更多的人士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其中必然会产生具有更广泛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从而使我们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重大课题投标书中明确指出第一个课题以翻译《杜威全集》为主,但同时开始进行启动性的研究。在此之后,我们希望另立或扩大课题,以期与其他专家一道在这方面继续进行较深入、广泛的研究。

在“985 二期”时,我们曾设想设立一个《杜威早期著作》的翻译与杜威哲学初步研究的课题。考虑到《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更有价值,因而改为《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课题。但在具体从事研究时,我们感到单是研究杜威早期,甚至中期著作都不足以揭示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应当把这个课题放到整个《杜威全集》的广度上来思考。因此我们就决定把原“985 二期”课题放到启动对《杜威全集》的研究的层次上来。实际上是把二者结合起来了。但我们的工作量并未减少。因为除了《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这

序 言

部书稿外,我们还另外完成了其他几部相关书稿。

这部书稿本来早就应当完成的。由于我们的精力主要放在《杜威全集》翻译的审校上,我自己又有一些其他亟待完成的工作要做,尽管课题组成员的成果早已完成了,我却未能来得及编辑整理。现在总算完成了。我自己对这部书稿并不太满意,但作为一部启动性著作它大体上是过得去了。我们的课题组成员为这部书稿已尽了很大努力。有的篇章写得还是较为细致和深入的。当然由于多人执笔,各人思路、风格不尽一致。我在统稿中也感到难以增删,只好仍尊重各人的风格,只在体例上做了一些调整。

本书各章执笔人如下:

刘放桐:序言,代绪论,上、下篇引言,上篇第一、二、三章,下篇全部,附录两篇;马荣:上篇第四章;魏建华:上篇第五章;徐英瑾:上篇第六、十三章;汪堂家:上篇第七、九、十章;郑国玉:上篇第八章;冯平:上篇第十一章;孙斌:上篇第十二章。

目 录

001 / 序言

001 / 代绪论 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

上篇 杜威哲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020 / 引言

023 / 第一章 杜威的哲学概念及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039 / 第二章 杜威的经验概念重释

056 / 第三章 杜威与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078 / 第四章 杜威和实用主义真理论的三个层面

094 / 第五章 杜威哲学中的偶然性思想

116 / 第六章 杜威的演化论式的知识论图景

140 / 第七章 杜威论科学对精神生活的意义

154 / 第八章 杜威对传统政治哲学的三大突出变革

171 / 第九章 杜威的教育哲学的当代意义

183 / 第十章 道德自我、道德情境与道德判断

195 / 第十一章 杜威价值哲学之要义

261 / 第十二章 杜威美学的当代意义：重返弥漫于生活本身之中的连续性

303 / 第十三章 从杜威的心理学到丹尼特的“异类现象学”

下篇 杜威与实用主义在中国

328 / 引言

331 / 第一章 实用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353 / 第二章 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的政治和文化冲突

370 / 第三章 杜威哲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386 / 第四章 市场经济与实用主义的道德理论

413 / 附录一 实用主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424 / 附录二 《杜威全集》中文版序言

代绪论

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

关于如何重新评价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及其在现代的意义，特别是在当代中国¹的意义，至少应当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探索。一个方面是：如何进一步克服几十年的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将实用主义简单化和片面化，以致将其全盘否定的倾向。由于这种倾向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的，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克服这种倾向曾经是困难重重。但在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后，这方面的境况已有了很大变化，上述倾向已不突出了，这为解决另一方面的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另一个方面是：在西方哲学的现代变革以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这个大背景下重新理解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的根本意义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从理论上说，这方面涉及的问题比前一方面更为复杂，因为它既需要重新研究和理解实用主义，也需要重新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早已有志于此，因各种原因未能深入下去。本文将就一些主要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想法，至于具体的论证，只好留待以后分别去作了。

第一，杜威哲学的根本意义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

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是对皮尔士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如何看待杜威哲学的根本意义，实际上要涉及整个美国实用主义的一般意义，即知道什么叫做实用主义。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相当复杂的问题。

说其简单，是因为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众多德国哲学家那种刻意追求严密完整的体系，以致使其实理显得深奥莫测、晦涩难懂不同，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在表述自己的理论时避免抽象思辨，其含义相对简单明了。他们对什么是实用主义都作过清晰明确的阐释。许多哲学辞书和教

科书对实用主义的释义也大都一目了然，有一般哲学常识的人理解起来都不会感到困难。由于“五四”以来实用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较大流传，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进行的政治和思想批判运动几乎都把实用主义当作重要批判对象，因此许多没有研究过西方哲学、对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了解不多的人，对什么叫实用主义往往都会有一定印象，能给出某种回答。这些回答虽不见得严密、准确，但往往能涉及实用主义的某一种意义。

说其复杂，是因为实用主义哲学家们对实用主义的意义的具体说法彼此并不完全一致，所强调的意义更是各不相同。这不仅是后期的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对早期的实用主义（古典实用主义）有重要的改造和发挥，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在对实用主义的理论的表述形式、重点等方面也往往不同。例如，在皮尔士实用主义中意义理论具有相当突出的作用，詹姆士往往强调实用主义作为真理论的意义，杜威因强调实验和探索而把实用主义称为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同一哲学家在不同角度和语境下对实用主义的含义往往也有不同表述。杜威在谈到思想、观念的真理性在于它们能充当人们的行为工具时，称自己的理论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当他谈到作为有机体的人与环境，或者说经验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时，他称自己的理论为经验自然主义（Empirical Naturalism），我们当然可以用实用主义的这些特定的理论形态来表述实用主义，为了使对实用主义的理解有更多的具体性，也应当具体地研究和阐释这些特定的理论形态。但是实用主义的这些特殊的表达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它们往往在突出了实用主义的某一特殊意义而忽视了其他意义，有时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把某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某一种特定的理论当作实用主义的一般理论，甚至当作是整个实用主义的核心理论，那就可能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势必对实用主义的根本意义产生某种扭曲。实用主义在中国过去长期被简单否定，从社会背景说是由于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预，从理论根源说是由于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实用主义的某一或某些的确存在的特

殊的意义，而忽视或者没有去追问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相当广泛的哲学思潮的根本意义。如此说来，准确地回答什么叫实用主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因此，为了把握实用主义的根本意义，我们不能只着眼于某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更不能只着眼于他们某一方面的理论，而要揭示贯彻于实用主义的各个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学说的各个方面理论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透过实用主义的各个方面，或者说它的各种特殊理论去揭示它们的共同理论取向。在实用主义的各种意义中，我觉得只有对行动、行为、活动、过程的强调，也就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才是它们的共同理论取向，因而也只有这种意义才是实用主义的根本意义。

中国哲学界过去在谈论实用主义时往往把它归结为一种真理论，似乎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把真理与有用相提并论的观点就是实用主义的根本观点。英国哲学家罗素和布拉德雷以及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等人在批评詹姆士和杜威时也是抓住这一点。其实这些哲学家对詹姆士和杜威的真理论的理解都有片面性。这点暂时撇开不论，单就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的真理论本身来说，也不能说就是他们的根本性理论。他们把真理当做行为的工具，已经表明他们认为行为具有比真理更高的意义。真理的目标是适应行为、行动、实践的要求，只能由行为、行动、实践来检验和证实。真理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一个由此及彼的发生过程；真理不是处于人的行动之外，而是处于行动之中，是在人的行动和实践中获得的。总之，一切真理都以人的行为、实践为转移。离开实践来谈论真理，那真理就失去了任何现实意义。例如，在皮尔士看来，任何认识和真理如果不能引起行为和习惯，就没有任何意义。“思维的整个机能在于引起行为习惯，而与思维相关、但与它们的目的无关的一切，则是思维的累赘，而不是它们的部分。”^①杜威也一再强调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完全在于其引起行动的功能。“其实，作为效用的真理，指的是把观念和理

^① 5. 400，即《皮尔士文集》第5卷第400段，下同。

论可能做到的用来为经验的改造作出贡献。”(MW - V12P170)^①

随着语言分析哲学在美国的流行,用语言分析理论,特别是意义理论来解读实用主义的风气在一部分美国哲学家中相当流行,皮尔士关于观念、真理的意义应当由实践来证实的观点被当作是一种意义理论。因而皮尔士哲学,甚至整个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意义理论。中国哲学家中也有人赞成并援引这种观点。应当承认,这些哲学家的观点有一定理论根据,他们对实用主义的某些阐释也很有价值。然而,意义毕竟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可以运用于一切领域。如果因为一种理论具有意义就说它是意义理论,那任何理论都将是意义理论。这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所以谈论某种意义理论时,首先应当限定意义所指,也就是意义的意义是什么。当语义学家谈论意义的意义时,他们同样不能不赋予语义以某种所指的意义(不管是作为对象语言的意义还是作为情感语言的意义)。皮尔士曾被语义学家引为权威。他有时确用符号来表示意义,但符号的意义归根到底还是要超越符号本身而及于符号以外。总的说来,从皮尔士起,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谈论的意义的意义仍然是相对于人的行为习惯、实践而言的。皮尔士明确地说:“对一个概念的最完备的说明在于对这个概念所必然引起的习惯的描述”(5. 491);“一个事物的意义简单说来就是它所涉及的习惯”(5. 400)。离开了行为、习惯或者说实践,所谓意义就变成了无意义。因此后来詹姆士,特别是杜威并不强调意义理论。杜威后期甚至批评了分析哲学家们的意义理论。在和 Arthur F. Bentley 合著的《认知与所知》(*Knowing and the Known*)一书中,明确地提出意义这个词含混,建议根本就不要使用。(LW - V16P266)如果把杜威的实用主义也归结为意义理论,恐怕他不会同意。

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虽然都批判作为存在论的传统形而上学,但他

^① 《杜威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分为早期著作(The Early Works)、中期著作(The Middle Works)、晚期著作(The Latter Works)三部分,本文引文中分别用 EW、MW、LW 代表其早期、中期、晚期著作,用 V 和 P 分别代表各期著作的卷和页。例如 MW - V12P170 指杜威中期著作 12 卷英文原版第 170 页。

们又都企图建立一种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弊端的新形而上学。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而这种形而上学同样通向人的行动、行为、实践。杜威的经验和自然概念当然都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但它们与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有着原则区别。它指的既不是物质的存在，也不是观念的存在，而是人作为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或者说贯通作用。在此，有机体（经验）是处于一定环境（自然）下的有机体，环境是受到有机体作用的环境。二者不是分离开来的独立的存在，而是处于相互作用、贯通的过程之中，而这正是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过程。因此，从存在论上说，杜威等人的哲学的根本之点同样在于对行动、生活、实践、过程的强调。一些西方哲学家把杜威哲学归入所谓过程哲学之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其他方面的理论同样以生活和实践为中心。例如，杜威的探索方法既不同于传统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家的方法（例如传统逻辑的经验归纳法和理性演绎法），也不同于现代分析哲学家的现代逻辑或语言分析方法和现象学家的现象学方法，其根本之点就在杜威把探索过程当作是知和行、认识和实践统一的过程，而这正是行动、生活和实践的过程。

总的说来，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最关注的是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中，或者说处于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生存和命运。如何通过人本身的行为、行动、实践来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其所面对的世界（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排除人所面对的种种困惑、疑难和障碍，由此使人不仅得以继续生存下去，而且还能求得发展，这些就是他们的哲学最关注的根本问题。实用主义正是由此被称为是关于人的实践和行为的哲学。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莫利斯说：“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人类行为肯定是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①

^① Charles Morris: *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 New York: G. Braziller, 1970, p. 10.